

清初关中李念慈诗论的时代精神

冉耀斌*

〔摘要〕 李念慈为清代关中诗人,其诗学理论继承了中国古代诗论如“诗本性情”、“文以明道”、“江山之助”、“诗穷而工”等许多优秀思想,并将其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清初文艺思潮紧密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他不但重视作家的人格修养,而且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认识价值,有着积极的用世精神。其诗歌理论兼容并包,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在清初诗论中独具特色,值得学界重视。

〔关键词〕 李念慈;诗本性情;文以明道;江山之助;诗穷而工

清初关中文人之兴盛、诗歌创作之繁盛名闻海内,“三秦诗派”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三秦诗派”作家众多,成就突出,以质朴劲健的“秦风”特征闻名于时^①。其诗学理论也颇与江南、山左等地不同,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蒋寅先生认为在清初天下至少形成三个地域性的诗学分区:江南诗学、山东诗学和关中诗学。他还指出关中诗学不同于江南、山东,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②。清初关中诗学有着强烈的道德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明代格调派的观念,注重诗法和诗律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绩。李念慈(1628—1699)为清初陕西泾阳人,关中学人的代表之一。他一生仕宦南北,周游天下,其活动已经走出了关中一隅,在京师、江南、山左、荆襄都有广泛的交友,其诗学理论也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吸收了当时先进的诗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体系,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

清初关中诗人由于地域的缘故,论诗大多标举盛唐,主张格调,宗法明代前后“七子”。李念慈虽然也以唐诗为正宗,对清初宋诗风深表不满,他在寄孙枝蔚的信中即对其学宋诗提出批评,但他和李因笃、康乃心等关中诗人不同,并不推崇格调声色等诗歌形式,而是专力探求为诗之本。他倡导诗歌要“根抵性情,蓄积学问”,对那些“搜奇穷巧、斗异翻新”,徒尚文辞华巧,毫无思想内容的作品极为厌恶^③。李念慈与钱谦益交好,钱谦益对其诗评价亦较高。钱谦益于清初极力排挤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但李念慈并没有闻风影从,他对前后七子之代表李梦阳、李攀龙评价都较高。他和竟陵派诗人谭元春子谭籍要好,对竟陵派也赞誉有加,可见其开阔的人生胸怀和兼容并包的诗学态度,与晚明、清初许多党同伐异的诗学论调截然不同。

* 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730070。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清代三秦诗派及秦陇文化研究”(10YJC751065)中期成果。

① 冉耀斌:《三秦诗派及其文化品格》,《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

② 蒋寅:《康乃心及其诗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③ 李念慈:《见山楼诗序》,《谷口山房文集》卷二,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上：“诗本性情”与“文以明道”

李念慈论诗已经突破了晚明、清初的门户之见，也扬弃了关中诗人主张格调、崇尚诗法的地域传统，直探诗歌之本源问题，他主张“诗本性情”。其《计甫草甲辰草题词》云：“夫诗本性情，非可诡焉为之。”诗本性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旧命题，历代诗论家多有评说。性情即人的气质秉性，作为诗歌评论的术语，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钟嵘曾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在古代文论中，性情又称“性灵”，也是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术语。颜之推云：“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颜氏家训·文章》）姚思廉也说：“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抒怀抱。”（《梁书·文学传序》）这里所说的“性灵”，大抵指一种敏于感受的情性，偏重于个人的审美情趣。“性灵”作为著名的文学主张，要到明代公安三袁才正式确立。袁宏道云：“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①这里所谓“性灵”指一个人真实的情感欲望，这种情感欲望是每个人独有的，是每个人的本色。这种推崇诗歌表现个人情感欲望的文学主张，摆脱了明代中期以崇古鉴今为风尚的文学思潮的束缚，对当时文坛影响颇大。

明末清初，也有许多学者提倡诗本性情之说。顾炎武曾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②黄宗羲亦云：“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情）者何其少也。”^③但是清初诸家所谓性情，与公安派所提倡的“性灵”颇不相同。公安派提倡的性灵是个人的情感欲望和人生感受，注重自己的个性体验。而顾、黄诸家所主张的性情不仅为作者的人生感受，往往与时代精神、现实内容相结合，强调

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因此黄宗羲将其分为“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黄宗羲曾说：“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歊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马雪航诗序》）“一时之性情”为作家的个人感受，“吴歊越唱，怨女逐臣”各道其心中之事，虽然都为真实感受，但其价值有大有小，只有那些合乎孔子所倡导的“兴观群怨”的诗歌，具有深广的时代意义和积极的伦理价值的诗歌才称得上“万古之性情”。黄宗羲这样区别性情，和他经世致用的文学观有密切的联系。李念慈也推崇这种“万古之性情”，其《萝村诗集序》云：“诗与乐相为表里者也，其始发乎一人之性情，而感乎千万人之性情。必其实有动于中，不能已于自吐之怀，而后永言出之，时则歌咏明盛，时则悲悯天人。当其忠孝激发，离忧怨慕，深于一往。人之读之者，因得以见其时世之盛衰，风俗之贞淫，人才之通塞，民生之休戚。莫不憬然感，愀然思，其人之性情，虽旷世而亦若与之相接，夫岂徒然而作也哉？”这种“性情”虽“发乎一人之心”，但“感乎千万人之心”，能够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所以能传世不朽。

明末清初，政治黑暗，社会动乱，许多思想家深痛晚明文人的空疏不学，提倡经世致用的文风，这种实学的思潮也渗透到了文学批评之中。顾炎武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他曾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④受实学思潮影响，清初诗人多倡导经世文章。李楷曾说：“诗之为教，内淑身心，外治宇宙，非己之急物与天下国家之大故，可以不作，作之无益。”（《谷口山房诗集序》）李念慈也批评晚明文人的空疏不学，倡导作者创作“内之极性命之精微，外之备

^①袁宏道：《序小修诗》，钱伯城：《袁中郎集笺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7页。

^②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72页。

^③黄宗羲：《马雪航诗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④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页。

经世之大法,近之在乎一身,而远之俟诸来者”的经世宏文(《胡石庄先生绎志篇序》)。

从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儒家“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的传统价值观成为清初学者的普遍追求。顾炎武认为有益的文是“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之文,虽然指的是学术文章,同样适用于诗文创作。黄宗羲也曾说:“大凡古文传世,主于载道,而不在区区之工拙。”(《与李杲堂陈介眉书》)他更推崇文道合一的至文。李念慈也主张“文以载道”,这和清初实学精神是一致的。他曾说:“盖言不载道,不足为言,而苟非实有见于道而身行之,则亦不能为载道之言。”(《答方田伯书》)虽然“文以载道”的思想有其局限性,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削弱了其审美价值,但是在明末清初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时社会急剧变化,政治混乱,尤其是易代之际,正是“天崩地解”、“率兽食人”的时代,伦理道德观念崩溃,民生极为凋敝,重建儒家的政治秩序和道德观念成为清初学者最为关心的当务之急。顾炎武虽然强调“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与人书三》),但他也知道其学不会为当世所用,因此他主张“穷而在下者”当“救民以言”(《与人书三》)。李念慈也希望为“明道之言”以俟后世,他曾说:“念今世仕宦,舍道则进,守道则退,既不能行其道,犹可为明道之言,以俟后世。”(《答方田伯书》)因此他特别强调诗歌对现实的反映和批评。杨素蕴曾称赞其诗“或因誉以为规,或即物以会理。刺人也,而实以讽世;纪事也,而可以考时;咏物写景也,而其山川风土物产俗尚之美恶贞淫,时会之变迁好尚,政教之得失兴废,皆可因而得之”(《谷口山房诗集序》)。

由此可见,“诗本性情”和“文以载道”是清初重要的诗学观念,这两种思想相辅相成,弥补了对方的偏失和不足。既注重诗歌的社会价值,又倡导诗歌的审美价值,开创了较为良好的创作风气,是清初诗坛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诗学观念的影响下,清初诗人对儒

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也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它新的时代内涵。

孔子曾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又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司马迁也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们都强调诗人要对感情有所节制,诗歌要有中和之美,“温柔敦厚”也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则。后人在阐释温柔敦厚之时,过多地强调了温厚和平,忽略了对激昂感情的抒发,导致诗歌走向平庸肤廓之弊。明末清初,许多诗人有感于国破家亡之痛,激昂奋发,长歌当哭,与传统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相去甚远,也导致他们对“温柔敦厚”的诗教重新反思。

黄宗羲等人论诗主张性情,最重要的是要抒发“真情”。他批评近人为诗“情随事转,事因世变,干啼湿哭,总为肤受”,“非不出于性情也,以无性情之可出也”^①。施闰章也主张作诗应当“言必由衷”,赞扬方文诗“款曲如话,真至浑融,自肺腑中流出,绝无补缀之痕”^②。李念慈也称赞杨素蕴之诗“直吐胸臆,无所诡饰,发乎情,止乎义”(《见山楼诗序》),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人生世间,当然有喜怒哀乐之情,发于词章,皆为真诗,这就是孔子所谓“思无邪”的本义。因此清初诸人将温柔敦厚进行了新的阐释。黄宗羲批评那种认为“温柔敦厚”就是“委蛇顿踵,有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的庸俗观点。他认为四时有发敛寒暑,人情有喜怒哀乐,“温柔敦厚”也不止为发敛和喜乐,还应包括寒暑之气,怒哀之情。他还进一步从《诗经》找到根据,孔子也没有将《考槃》、《丘中》等诗删掉,因为它们“疾恶思古,指事陈情,不异薰风之南来,履冰之中骨,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也”(《万贞一诗序》)。以鲜明的是非、强烈的爱憎为温柔敦厚的主要内涵,提倡“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

^①黄宗羲:《黄子先诗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2005年,第32页。

^②施闰章:《西江游草序》,《学余堂文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蕴结”的诗风,在清初具有典型的意义。顾炎武也说:“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日知录》卷十九)他还进一步倡导诗歌要有“讥刺”,强调对现实的批判,他曾引用晋葛洪《抱朴子》云:“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日知录》卷二十一)这和世俗所谓温柔敦厚截然不同。李念慈也认为“性情”并不只是喜乐之情,还有“怨怒之音”,他也指出《诗》三百篇“亦多幽愁忧思悲愤激切之作”(《计甫草甲辰草题词》)。虽然他承认诗要归于“温柔敦厚”,但也肯定那些“怨怒之音”,因为它们都出于“性情”,是“真诗”。李念慈也有许多悲愤激切之作,如《异时》、《盗贼》、《荆州杂兴六首》等揭露军队腐败,谴责横征暴敛,完全没有温柔敦厚的虚假面具。顾景星曾云:“作诗必贵乎真。秋水芙蓉,真诗之辞致也。凶年菽粟,真诗之骨骼也。刍翁兼而有之。”^①

与顾、黄等遗民诗人不同的是,康熙年间新朝进士出身的施闰章对温柔敦厚的解释可谓庙堂诗人的代表观点。施闰章云:“夫诗与乐为源流,……大抵忧心感者其声噍以杀,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君子怀易直子谅之心,则必多和平啍缓之声,诚积之于中不自知其然也。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佳山堂诗序》)施闰章虽然承认诗人的人生际遇不同,诗歌风貌也不一样,但他特别强调“和平啍缓之声”,认为这才是温柔敦厚的诗歌。他还进一步倡导“清明广大、一唱三叹之遗音”(《重刻何大复诗集序》)。这种“清明广大”诗风的要求,正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相表里,体现了清初国家稳定之后,统治者鼓吹休明、提倡清真雅正诗风的祈尚。康熙皇帝崇尚唐诗,其文学侍从冯溥、张英、陈廷敬等也大力鼓扬,倡导为“盛世清明广大之音”,歌功颂德,让温柔敦厚重新纳入了封建政教伦理的范畴。李念慈虽为新朝进士,但他仕途坎坷,饱经忧

患,其诗“欢畅之言少而愁苦之言多”(《谷口山房诗集自序》),与这种庙堂风格格格不入。

下:“江山之助”与“诗穷而工”

李念慈论诗不但主张本于性情,还提倡诗歌要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主张多阅历才能开拓心胸,放宽视野,因此他对“江山之助”的诗学命题极为推崇。他曾说:“文章一道,虽根性灵,然每有待于山水朋友,而后颢博之观,精妙之绪,映发抉摘,愈出愈新。”(《蒋玉渊历下存笥草小序》)施闰章也主张赋诗要有江山之助。其《阳坡草堂诗序》云:“诗言志,视其性情,苟非其人,虽学弗工也。其次则视地,丘壑之美,江山之助,古之咏歌见志者,往往藉是。”他们都主张诗人不但要有率真的性情,深厚的学力,还需要广泛的阅历,饱览名山大川,才能激发作家的情思。这些论断都符合诗歌创作的规律。

“江山之助”是一个古老的诗学命题。刘勰曾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他认为文学风格与特定的地域风物征候有一定的联系,屈原作品瑰诡朗丽、想象奇幻的特点即受益于楚国云蒸霞蔚的江山景致孕育。刘勰还指出:“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都说明了诗人创作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现实的依赖关系。因此,后人多强调人的现实阅历对诗文创作的制约关系。如王夫之更强调:“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薑斋诗话》)他认为大凡优秀的作品都是诗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产物,如果王维不到终南山就写不出“阴晴众壑殊”这样观察细致的佳句,杜甫不登岳阳楼也写不出“乾坤日夜浮”这样气势磅礴的警句。此可谓“只于心目相取处得景得句,乃为

^①顾景星:《谷口山房诗集集评》,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卷首。

朝气,乃为神笔”^①。

古人所谓“江山之助”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诗人生长的地域环境对诗人创作风格的影响。班固曾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汉书·地理志》)明唐顺之也认为“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②。他们都强调了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对作家的影响。沈德潜也指出:“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所处之地。”^③正如刘勰认为屈原《离骚》奇幻瑰丽的风格得力于楚中云蒸霞蔚的江山景致孕育,明清诗人评论关中诗人诗作,也认为其诗歌受关中文化和秦地山水熏陶。王慎中序胡纘宗诗称:“昔季札观周乐,至于《秦风》,知其声之夏也,卜其将大叹其为周之旧。……至于专精果毅,敏于有为而不偷,则深厚之水土不为无助。”^④外地文士也多以地域风格“秦风”(或“秦声”)来评论关中诗歌,如陈子龙评李梦阳诗“峥嵘清壮,不掩本色,其源盖出于秦风”^⑤。

“江山之助”另一个层面的含义是诗人通过广泛的阅历,可以改变其固有的地域特征,呈现出兼容并包、气势磅礴的多元风格。清盛大士曾说:“诗画均有江山之助。若局促里门,踪迹不出百里外,天下名山大川之奇胜,未经寓目,胸襟何由而开拓?”(《溪山卧游录》)许多诗人游历天下以后,诗文风格都发生了改变。《新唐书》曾说张说“为文属思精壮”,后来贬谪岳州,“而诗益惟惋,人谓得江山助”^⑥。不难看出,诗人一旦“行万里路”,丰富了阅历,开拓了胸襟,其创作必然受各地不同的山川地貌和人情风俗的影响发生改变,显示出丰富的审美内涵。

李念慈也承认诗文风格与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西北和东南地气不同,诗文风格也迥异。他曾说:“诗文之体气相因,岂不以其地哉?

西北山川所自起,厚重閼深,顾确确湍悍,往往碍舟车害行旅。渐至东南,则秀拔涟漪,可游可赏,然峭削漫涣矣,其地之人,性行才力文章,各因其山川之气而加之以习,罕相能也。”(《赵秋水近诗序》)他还进一步指出:“生乎东南者,不睹西北山川之雄伟,则苍凉灏博之气不出。生乎西北者,不睹东南山川之秀丽,则冲融缅邈之思亦无由发。”(《程然明诗序》)李念慈鼓励作家通过广泛阅历,取长补短,兼容并包,使创作臻于上乘境界。他认为赵秋水生于河北,当有燕赵悲歌慷慨之气,但其诗“大而非肆,雄而浑,直而壮,伟而能,含蓄蕴藉”,主要原因是诗人“交尽东南,迹半寰宇,所至山川习尚亦多助焉”,因此能“兼南北之长而无其弊”。李念慈自己也是足迹半天下,交游满南北,所以其诗也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多元风格,施闰章即认为其诗“秦风而兼乎吴、楚者”(《李杞瞻诗序》)。李念慈还推崇通过广泛的游览,使创作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提高诗歌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他称赞金德嘉视学滇南边隅,“若文翁之于蜀,而又得于绝徼山川奇异之所映发”,其诗风格不但更进一层,而且诗中所绘“山水之形状,风俗之异同”,“咸可以资考稽,备采风于古陈诗之义”(《居业斋诗钞序》),高度评价了其诗的丰富内容和认识价值。

“诗穷而工”也是李念慈诗论中又一重要观点,这一观点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自屈原起就有“发愤以抒情”(《惜诵》)的文学主张。后来司马迁也提出“发愤著书”的思想。后世许多困厄文人以此作为人生指导,努力著述立说,以求立言不朽。韩愈继承他们的思想,更提出“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的著名观点。《荆谭唱和诗序》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①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三,《船山遗书》,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05页。

②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荆川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③沈德潜:《芳庄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刻本。

④王慎中:《鸟鼠山人小集序》,《遵岩集》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⑤陈子龙:《皇明诗选》卷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46页。

⑥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10页。

也。”^①欧阳修进一步发挥前人的思想,提出“诗穷而后工”的主张:“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雨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奋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而愈工。”^②他们都认为诗人遭受厄运之时,抒发胸中不平之气,其诗才能悲凉慷慨,具有不朽的精神价值。

“诗穷”为何“能工”?主要因为历史上治日少而乱日多,诗人们报国无门,有志难伸,故多慷慨不平之气,发为诗歌,多有愁苦要妙之作。白居易曾说:“予历览古今歌诗,……多因谗怨遭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歿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又有已知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亦明矣。”^③黄宗羲也强调时代对创作的影响,他曾说:“天下之治日少而乱日多,事父事君,治日易而乱日难。”“蚌病生珠”,乱世却促使诗歌兴盛,他认为“汉之后,魏晋为盛,唐自天宝而后,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诗尤盛,无他,时为之也”(《陈苇庵年伯诗序》)。黄宗羲还主张文章为天地之元气,元气在平时,和声顺气,无所见寄,只有在“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涌郁遏,垒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他们都认为诗歌繁盛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动乱,“天地闭塞”,诗人通过创作来反映黑暗社会,抨击不平现实,具有一股淋漓的真气,那文章就不求工而自工,真如赵翼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兴,赋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集》)。明末清初正是“天崩地解”,社会动荡的黑暗时代,诗人们关心民族命运,哀叹民生艰辛的诗篇便有不朽的价值。

时代风潮只是诗歌创作的外在条件,而要创作优秀诗篇,还有赖于作家的自身修养,因此

李念慈对“诗穷而工”进行了新的阐释。《程然明诗序》云:“诗穷而后工,自昔人言之,靡不以为艰难坎壈不得志于时,然后其精神怀抱一发之于吟讽咏叹中,故能沉郁厚重也。殊不知诗本性情以出,性情由乎内,必先具有真挚笃厚者以为之本,而后感发存乎外,山水朋友交相资焉。”李念慈不但强调“诗本性情以出”,作家的个人修养决定诗歌创作的高下,还提倡广泛阅历,友朋切磋,开拓心胸,提高诗艺,才能创作出不朽的篇章。反之则不会有所成就:“苟非然者,在内初无其本,而跼蹐困厄于一乡一曲之中,在外又无所得于游览结纳,但以穷求工,天下其少穷老牖下者哉?”这样的作家虽然“穷”,但根本不会工于诗文。

他还进一步倡导穷士更要好游,将“江山之助”和“诗穷而工”两个诗学命题紧密联系起来。他曾说:“故士惟穷乃游,游则奚囊蜡屐造请过从,山水之情状,友朋之论说,无往不与我之性情引伸映发。穷愈久,游愈广,所得助于外者愈深,而诗之功力亦随之。”(《程然明诗序》)其友人大多是穷而好游之士,故其诗亦造诣非凡。他认为友人许虬诗歌气象不凡,其重要原因是穷而好游:“竹隐天资既绝,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困穷远宦,志业不遂,其气抑而日积所蓄日厚,故发于笔墨间,响滞力沈,直欲上溯楚骚。”(《万山楼诗集题词》)李念慈自己也穷而好游,他曾远宦河间、新城、廉州,三入荆襄幕府。虽饱经坎坷,潦倒江湖,但他不以为苦,就是因为南北奔波让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诗艺。

韩愈曾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李念慈也认为富贵者多受职位的羁绊,“或囿于乡县,或束于职事”,“其于山水,率止得其皮肤”(《程然明诗序》),无以发其性情,故创作不出优秀的诗篇。李念慈此论虽有道理,但还不够细致深刻。清代学者赵怀玉之论述更为精彩允当。他曾说:

^①韩愈《荆潭唱和诗序》,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2—263页。

^②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12页。

^③白居易:《序洛诗序》,《白居易全集》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70页。

“穷在下者，枕藉经史，舍是无他嗜好，故得为专门名家。达则官守劳其心，纷华蠹其志，纵汲汲于古，而夺之者众，其难一也。穷在下者，自治其业而已。达则操陶冶之柄，当以众人之文为文，而未可私为一己之事，古公卿说士之甘，不啻口出，而天下奉为宗匠，苟闻见有未周，精神或稍殆，则觖望多而令名遂损，其难二也。穷在下者，同类切劘，人乐攻其短。达则分位既尊，贡谏日至，虽其侪列，亦不敢遽肆讥弹，故有失而终身或不能自觉，其难三也。”^①由此可见，穷者由于无案牍之劳、应酬之累，故而能集中精力研究学问，潜心钻研艺术规律和创作技巧，其造诣自然不凡。另外，穷者因为有不平之气郁积于胸，借诗文以发抒胸中之块垒，当然不同于官

高位显者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

综上所述，李念慈的诗学理论继承了中国古代诗论的许多优秀思想，并将其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清初文艺思潮紧密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诗歌理论不但强调诗本性情，重视作家的人格修养，而且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认识价值，富有积极的用世精神。他还主张诗人在艰难困苦之时，更要立志高远，广泛阅历，师友切磋，提高诗艺，创作既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又有丰富的审美价值的优秀诗篇。其诗歌理论兼容并包，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在清初诗学理论中具有代表意义，值得学界重视。

（责任编辑：陆 林）

Spirit of the Time Reflected in Poetic Thoughts of Li Nianci in Early Qing Dynasty

RAN Yao-bin

Abstract: Li Nianci was a poet in the region of Guanzho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is poetic thoughts did not only follow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eory of poetry, especially the notions concerning poetic creation (e. g., embodiment of emotions and wishes; promotion of lofty ideas and principles; nurture and inspiration from nature; greatness as a consequence of personal sufferings), but added new contents to these traditional notions through connecting them with the literary practi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us showing a distinct spirit of the time. He emphasized both the personal quality of the poets as well as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cognitive value of literature, which speaks of his positive view on life. Characterized by its inclusiveness and systematicness, Li's poetic theory occupies a unique and significant pla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Li Nianci; embodiment of emotions and wishes; promotion of lofty ideas and principles; nurture and inspiration from nature; greatness as consequence of sufferings

^①赵怀玉：《存素堂文初钞序》，《亦有生斋文集》卷三，清道光二年刻本。